

## 从撰铭到书丹:董其昌《项墨林墓志铭》与 《项墨林墓志铭卷》

李万康

**内容摘要:**《项墨林墓志铭》系项元汴次子项德成请董其昌撰写的碑文。项氏家族曾两次请董其昌照原文书丹,第一次为制墓志铭碑,第二次为制神道碑。现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项墨林墓志铭卷》书于明崇祯八年,是项元汴季孙项禹揆为镌刻神道碑请董其昌书丹留下的碑文墨迹。该铭概述项元汴的生平懿行与志业成就,是研究项元汴的基础文献之一,原文收录于《容台文集》卷八,墨迹本在原文基础上有所改动。该书迹是极少数证据充分的董其昌遗存真迹之一,也是体现董其昌取法创变和践行其书法美学思想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

**关键词:**董其昌 书迹 项元汴 墓志铭

《项墨林墓志铭卷》(图见封二)是一件珍贵的董其昌小行楷真迹<sup>①</sup>。写本纵27厘米,横543厘米,共六段,由项元汴季孙禹揆装裱成卷。《铭卷》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黄惇先生做过简要释读<sup>②</sup>。学界普遍认为《铭卷》即董其昌《容台集》收录的《项墨林墓志铭》原本。但笔者研究发现,《铭卷》系项元汴后人为镌刻神道碑,请董其昌依其所撰旧文重书而留下的书丹墨迹。本文将结合文献,就项氏家族请董其昌撰铭、书丹的经过及墓志内容和《铭卷》的艺术价值等做考释。

### 一、重修项元汴墓与董其昌《项墨林墓志铭》

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生于明嘉靖四年(1525),嘉兴秀水人。先祖世

<sup>①</sup>本文简称该写卷为“《铭卷》”。

<sup>②</sup>黄惇:《作品考释·项元汴墓志铭卷》,《中国书法全集》第54卷《董其昌》,荣宝斋,1992年,第270-271页。

居洛阳,赵宋南渡以后,始祖项晋扈宋南辟,徙居嘉兴胥山乡。南宋绍定二年(1229),项晋孙项相在城中灵光里瓶山西侧筑孝友堂<sup>①</sup>。明初,项相第九世孙项邦迁秀水<sup>②</sup>。项邦长子项衡生项忠、项质和项文。项忠家族居胥山,五世六进士;项质家族居秀水,名人辈出,曾孙项笃寿一门三世五进士<sup>③</sup>。宣德五年(1430),胥山析属嘉善<sup>④</sup>,嘉善位于嘉兴府东北,秀水位于嘉善西南,故世称嘉善项忠支系为“北项”,秀水项质支系为“南项”<sup>⑤</sup>。项元汴乃项质曾孙,他是南项最杰出的文化人物;从曾祖项忠官至兵部尚书,授太子太保,则是北项最显赫的政治人物。

项元汴卒于万历十九年(1591)初<sup>⑥</sup>,葬于嘉兴陡门桥南寒字圩<sup>⑦</sup>。董其昌《项墨林墓志铭》载:“公与配钱孺人歿数十年,而次君德成图公不朽,属余以金石之事。”<sup>⑧</sup>可知墓志铭是应项元汴次子项德成的请求撰写的,他在请董其昌撰铭前夕,还请黄承玄<sup>⑨</sup>写过一篇《明故墨林项公暨配钱孺人墓表》。黄

①佚名:《嘉禾项氏宗谱》卷三《传略·项相》。上海博物馆藏清抄本。

②董份:《广东布政使司左参议少溪项公笃寿墓志》,焦竑编:《国朝献徵录》卷九九,《明代传记丛刊》第114册,台北明文书局,1991年,第112页。

③参见丁辉、陈心蓉:《嘉兴历代进士研究》,黄山书社,2012年,第418-419页。

④江峰青、顾福仁等修纂:《〔光绪〕重修嘉善县志》卷一《沿革》,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28页。

⑤高孟超在《项墨林墓志铭卷》拖尾题跋中记:“当先生之世,本支南北项,簪纓竞爽。”“本文”即指项衡支系。祝廷锡《竹林项氏世系记》亦记:“竹林西北隅,为里仁乡十都之西张圩,相传有南项、北项世家也。”(祝廷锡:《竹林八圩志》卷八《文徵内编》,《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9册,上海书店,1992年,第520页)

⑥项元汴卒年通常定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但李培《祭墨林先生文》曰:“万历辛卯月日,通家晚生李某谨以肴榼壶浆,致祭于墨林项先生之灵座前。”(李培:《水西集》卷九,《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4册,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灵座”表示项元汴尚未下葬。因命理学干支纪年以立春为一年之始,故万历庚寅年最后一天为1591年2月4日(即农历正月十一),2月5日立春方为辛卯年。所以项元汴当于万历十九年(1591)正月上旬去世,中旬下葬。

⑦伊汤安、冯应榴等修纂:《〔嘉庆〕嘉兴府志》卷一七《冢墓》,清嘉庆六年刻本,叶十五。

⑧董其昌:《容台集·容台文集》卷八,《四库禁毁书丛刊》第3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365页。

⑨黄承玄,字履常,号舆参,嘉兴人。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副都御史。勤政恤民,熟谙河务,政绩显昭,著有《盟鸥堂集》《河漕通考》等(汤齐、李日华等纂修:《〔崇祯〕嘉兴县志》卷一三《人物志·黄承玄》,《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534-535页)。

承玄是嘉兴籍经济名臣,其子黄卯锡娶项德成女项兰贞为妻,作为项德成的儿女亲家,他对项元汴颇有了解。墓表记:“公与孺人钱,歿而就葬,距今廿有七载,而仲子德成,惧懿行之终泯灭也,手自状公,既乞铭于李太史,而复欲余表隧道之石。”<sup>①</sup>可见墓表撰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项元汴墓乃夫妻合葬墓。由于墓表立于墓前颂扬逝者生平,墓志铭则埋入墓穴以备后世稽考。故项德成在父亲去世二十七年后,请人撰作墓表和墓志铭,可以肯定是为重修先父墓。原因可能是万历十三年到十九年,嘉兴发生史上罕见的连年旱涝大灾,项氏家族频遭饥民衅犯,到项元汴去世时,已元气大伤,不得已从简下葬。葬礼由长子项穆主持<sup>②</sup>。

项穆大约在万历三十年(1602)左右去世<sup>③</sup>。项穆去世后,家族事务由项德成主持,所以修墓重任落在了他的肩上。项德成在请黄承玄撰文前夕,草拟了一篇记录父母生平及项氏家系的传记,呈李维桢撰写行状及墓志铭,继而请黄承玄撰墓表。随后又持行状供董其昌参考,为先父撰墓志铭。李维桢所撰项元汴行状与墓志铭未见文集收录,内容不详。因为董其昌撰有《项墨林墓志铭》,所以推测李维桢所撰墓志铭应该是夫妇合葬墓志铭。两文的撰写时间,受制碑埋铭的工期限制,应一前一后相隔不久,即董其昌撰《项墨林墓志铭》与李维桢撰夫妇墓志铭大概仅数月之隔,时间亦在万历四十六年,最迟不会晚于四十七年。

在明代,立碑埋铭涉及撰文、书丹和篆额,先后需要支付三笔润资。所以,项德成请诸家撰文后,还要奉润资请名家书丹。“书丹”是刻碑的一道工序,原指用朱笔书于碑石以待镌刻,后来泛指碑文书写,润资丰厚,所得文本形态亦截然不同,故董其昌撰文与书铭不是同一文本。能提供证明的重要文献是《〔崇祯〕嘉兴县志》收录的谭贞默《董玄宰书项墨林志铭跋》:

余于里中贤达,耳目睹记,低回服膺者,得二项先生,一襄毅,一墨林,并上下千载,非常人也。纾国家之难,忠而能济,襄毅尚矣。若夫寄范少伯之雄贲,纵陶隐居之博物,邺侯笈也,漫士船也,顾虎头厨也,王家凿垣也,倪迂清秘也,于斯集大成焉。书法画品,出入晋元诸名家,迄

<sup>①</sup>黄承玄:《盟鸥堂集》卷一〇,上海博物馆藏明天启四年刻本。

<sup>②</sup>项穆:《书法雅言·王穉登〈无称子传〉》,《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上海书画出版社,1992年,第71页。

<sup>③</sup>学界多以《书法雅言》支大纶序,认为项穆卒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但据费元禄《吴越纪行》载:万历二十九年(1601)三月,费元禄游杭州,两访项穆(费元禄:《甲秀园集》卷二九《吴越纪行》,《四库禁毁书丛刊》第62册,第497页),可见万历二十九年项穆仍在世。

今纸贵。墨林自号学者,谓可当信谥云。生平骀麟大节,直与襄毅后先不朽。文孙嘉谟乞得董宗伯书铭,以示来祀。噫!长不朽矣。<sup>①</sup>

谭贞默是崇祯元年(1628)进士,官至工部主事<sup>②</sup>。曾协助汤齐和老师李日华修撰《〔崇祯〕嘉兴县志》,“时出其枕中秘以相佐”<sup>③</sup>。爱女嫁黄涛为妻,黄涛的父亲是黄卯锡,母亲是项兰贞<sup>④</sup>。从谭贞默题跋所谓“文孙嘉谟乞得董宗伯书铭”,可知项德成得到董其昌撰文后,改付家侄项嘉谟请董其昌书丹。项嘉谟是项元汴六子项德达的次子,因项德达已在项氏家族重修先公墓之前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去世<sup>⑤</sup>,故项德达一房在重建先父墓中的分工由子嗣承担。项嘉谟工诗画,著有《筠庵诸辨》《木石居杂录》《有清居诗话》等<sup>⑥</sup>,有诗选入曹学佺《石仓十二代诗选》,谭贞默赞其诗与魏晋名士阮咸、谢鲲一样,都是“一流诗篇”,皆以“雅简”取胜<sup>⑦</sup>,其诗文学殖在嘉兴享有盛名。所以项嘉谟大概被认为是当时家族中最合适的乞书人选。

谭贞默为《项墨林墓志铭》题跋的时间未详。不过,因天启五年(1625)正月,董其昌官拜南京礼部尚书<sup>⑧</sup>,始称“董宗伯”,故以跋中所谓“文孙嘉谟乞得董宗伯书铭”,可以确定谭贞默题跋的时间上限是天启五年春。又,《〔崇祯〕嘉兴县志》列谭贞默题跋于陆光祖《楞严寺重建募缘疏》之前,而嘉兴楞严寺动工重建,始于天启五年二月,次年九月竣工<sup>⑨</sup>。加之“募缘疏”属集资化缘文辞,撰于建寺初,所以谭贞默为《项墨林墓志铭》题跋的时间应该是在天启五年春或夏。该跋表明墓志铭由项嘉谟装裱并收藏,上石镌刻很

①汤齐、李日华等纂修:《〔崇祯〕嘉兴县志》卷二三《遗文五》,第1004页。

②谭贞默,初字孟恂,后更字梁生,号扫庵。其传记见原北平图书馆藏抄本谭贞默《著作堂集》(美国国会图书馆摄北平图书馆藏善本胶卷)附录康熙五年(1666)屠存智述《谭扫庵传》。

③汤齐、李日华等纂修:《〔崇祯〕嘉兴县志》黄承昊序,第4页。

④参见丁辉、陈心蓉:《嘉兴历代进士研究》,第227页。

⑤项德达,字秦望,娶钟氏。叶燮《项母钟曹两孺人合传》载,“秦望君之歿也,钟孺人年二十九”,“钟孺人卒年六十六”(叶燮:《已畦集》卷一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4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187页)。叶燮《太学项君暨配张孺人合葬墓志铭》又记:“丙戌鼎革,钟卒。”(叶燮:《已畦集》卷一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4册,第159页)“丙戌”即顺治三年(1646),以钟氏享年65岁前推,项德达当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去世。

⑥佚名:《嘉禾项氏宗谱》卷三《传略·嘉谟》。

⑦朱彝尊:《明诗综》卷七六“项嘉谟”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02页。

⑧张廷玉等:《明史》卷二八八《文苑四·董其昌》,中华书局,1974年,第7396页。

⑨汤齐、李日华等纂修:《〔崇祯〕嘉兴县志》卷八《寺观下》,第315页。

可能也是由他雇工完成。

项嘉谟长居嘉兴,早年“赋性恣荡不羁,中岁产落”<sup>①</sup>。崇祯年间,流寇四起,北方形势危机,项嘉谟乞武职,投笔出塞,任蓟辽守备,不久因官场掣肘,弃职归里<sup>②</sup>。顺治二年(1645)六月,清兵屠掠嘉兴,项嘉谟怀束平生著作,率子项翼、项心与妾张氏共投天星河,在籍殉难<sup>③</sup>。《项墨林墓志铭》也随其家破而从兹永泯,谭贞默题跋遂成该卷短暂存在的唯一证据。

## 二、立神道碑与董其昌重书《项墨林墓志铭卷》

明清文献中记载的《项墨林墓志铭》墨迹实有三本:一是项嘉谟藏本,毁于明末兵燹;一是陆时化经眼本,著录于《吴越所见书画录》<sup>④</sup>,下落不明;还有一本是高士奇、陆心源递藏本,著录于《穰梨馆过眼续录》<sup>⑤</sup>,二十世纪上半叶流入日本。其中,陆时化经眼本裱为集册,有董其昌自题,铭尾钤“和香”“和香亭主”“海野居士”三印,董其昌自题后有范允临、陈继儒二跋,同高、陆递藏本的装裱形制、钤印构成和题跋顺序,均存明显差异,当属伪本。

《铭卷》即高、陆递藏本,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有董其昌自题,又陈继儒、范允临、王廷宰、高孟超、张廷济、金森、金蓉镜等名家题跋共十则,又褚德彝、黄葆戉观款二则,另有项禹揆、项奎、高士奇、陆心源、裴景福、高岛菊次郎等鉴藏家印记,共计86枚。董其昌自题云:“墨林雅士,名满吴越间,余此志亦具其神照。次孙相访,请余书,且以镌石,亦王谢子弟家风也。书此应之。崇祯八年乙亥子月。”(图1)可见《铭卷》是董其昌应项元汴次孙的请求书写的,时间在明末崇祯八年(1635)十一月。董其昌时年八十一岁,次年九月便仙然离世。

为什么项嘉谟请董其昌书《项墨林墓志铭》之后,过十馀年项氏家族又再次乞书呢?董其昌的自题中透露,“次孙”请书的目的是“镌石”。陈继儒题跋又记,“其孙□□即为流通”(图2),“流通”表示墓志铭入石刻碑后,置

①朱彝尊:《明诗综》卷七六“项嘉谟”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0册,第702页。

②佚名:《嘉禾项氏宗谱》卷三《传略·项嘉谟》。

③盛枫:《嘉禾徵献录》卷六《兵部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25册,齐鲁书社,1996年,第357页。

④陆时化撰,徐德明校点:《吴越所见书画录》卷五《又董文敏楷书项墨林墓志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478-480页。

⑤陆心源:《穰梨馆过眼续录》卷八《董文敏书项墨林墓志铭卷》,《续修四库全书》第10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30-532页。

于地面。据《〔嘉庆〕嘉兴府志》记，项元汴墓有“黄承玄墓表，董其昌神道碑”<sup>①</sup>。神道碑是记载死者生平懿行的石碑，北宋中期以前，神道碑和墓志铭区别明显，前者记墓主功德，立于墓前神道上，后者记墓主生平，埋于棺椁前；北宋中期以后，两者逐渐合流，民间多以墓志铭替代神道碑<sup>②</sup>。由于项元汴墓志铭与其夫妻合葬墓志铭，早在万历四十七年左右已埋入墓穴，故十馀年后董其昌再次书铭，显然是为项元汴墓立神道碑。



图1 《项墨林墓志铭卷》  
董其昌自题(1635)



图2 《项墨林墓志铭卷》  
陈继儒题跋

所以，《铭卷》的准确定义是“书丹”。该书丹由项元汴次孙请书，但“次孙”到底是哪一位，却存在一定争议。黄惇先生依据前引谭贞默题跋，认为“次孙”是项嘉谟<sup>③</sup>。金蓉镜在《铭卷》卷尾题跋中则认为：“庙谟，字楚襄，即跋中所谓‘次孙’请书者，盖德成请铭，而庙谟请书。”金蓉镜的依据来自项氏宗谱，该谱记载项元汴孙子有九位，分别是皋谟、鸿谟、庙谟、禹揆、隆锡、圣谟、嘉谟、声表和徽谟<sup>④</sup>。由于次子项德成和五子项德宏膝下无男，项德成将堂兄项梦原的四子项睿谟和三弟项德新的次子项庙谟过继为嗣；项德宏则将四兄项德明的次子项隆锡和六弟项德达的三子项声表过继为嗣<sup>⑤</sup>。过继

①伊汤安、冯应榴等修纂：《〔嘉庆〕嘉兴府志》卷一七《冢墓》，叶十五。

②参见郑嘉励：《南宋的志墓碑刻——以浙江的材料为例》，《东方博物》第45辑（2012），第84-86页。

③黄惇：《作品考释·项元汴墓志铭卷》，《中国书法全集》第54卷《董其昌》，第270页。

④佚名：《嘉禾项氏宗谱》第十九代。

⑤佚名：《嘉禾项氏宗谱》第十八代“德成”条。

后,父母称呼与排行发生变化<sup>①</sup>。于是项庙谥改叔为仲,成为墨林次孙。金蓉镜的推测符合宗谱中的过继关系。

不过,依据族谱中的诸孙齿序和过继关系确定“次孙”,虽然精确,但并不妥当。因为外人并不了解家族内部的诸孙齿序和过继关系,通常将长孙以下的孙子统称“次孙”。如万历元年(1573),朝廷以明初工部尚书宋礼治理大运河贡献卓著,恩准宋礼入河南永宁县乡贤祠,并恩荫嫡孙,敕文曰:“再将嫡次孙六人:二人给与衣巾,守坟奉祀;四人给与衣巾,令赴南旺宋公祠居住。”<sup>②</sup>这里的宋公“嫡次孙”一共有六位。李培《疑雨斋诗集叙》亦称:“孔彰,墨林公之次孙也。”<sup>③</sup>李培曾“获侍墨林先生者,几四十年所”<sup>④</sup>,熟悉项氏家族。但依然将项氏宗谱中的项元汴第六位孙子项圣谟称为“次孙”,可见外人称“次孙”与家谱中的“次孙”未必是同一概念。因此,董其昌所谓“次孙”,实际上是指长孙项皋谟以下的其他八位孙子之一。

《铭卷》中的王廷宰题跋云:“子毗又以文敏书入石。”(图3)可知镌石立碑由季孙项禹揆完成。项禹揆在卷中钤盖“和香”“墨林季孙”等二十二方收藏印。鉴于前一本《项墨林墓志铭》由项嘉谟请书并收藏,故以项禹揆收藏印可知,崇禎八年请董其昌再次书丹的“次孙”是项禹揆。项禹揆是项德明长子,字子毗,太学生<sup>⑤</sup>。明亡后,在鲁王朱以海监国政权任职方司。顺治十六年(1659),卷入李之椿案,被捕下狱,同李之椿、沈士柱等四十八人,于当年三月十四日清明(4月5日)在南京遇害。



图3 《项墨林墓志铭卷》  
王廷宰题跋(1644)

①参见毛德富:《古人命名与宗法观念》,《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3期,第60-61页。

②张楷纂修:《永宁县志》卷八《杂志·宋康惠公恩荫案》,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叶十三。

③李培:《水西集》卷八《疑雨斋诗集叙》,《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4册,第193页。

④李培:《水西集》卷八《疑雨斋诗集叙》,《四库未收书辑刊》第6辑第24册,第193页。

⑤佚名:《嘉禾项氏宗谱》第十九代“禹揆”条。

当时按律籍没家产,亲眷流徙<sup>①</sup>。家弟项徽谟为保项禹揆所藏祖遗书画免遭劫难,冒险匿藏,《铭卷》得以保全<sup>②</sup>。

项禹揆请董其昌再次书丹,表明项德成在天启二年(1622)病故<sup>③</sup>之前并未完成修墓工程。直到十馀年后,项禹揆请书并刻石立碑,项元汴墓经子孙两代历时近二十年努力,才终于彻底完工。重修后的项元汴墓是嘉兴重要名人墓之一。清嘉庆四年(1799)至五年,嘉兴知府伊汤安主持修纂《嘉兴府志》,经核实,当时项元汴墓尚存黄承玄墓表和董其昌神道碑<sup>④</sup>。但同治三年(1864)至光绪四年(1878),嘉兴知府许瑶光、吴仰贤等修纂《嘉兴府志》,所载项元汴墓一条下,注其出处为“伊志”<sup>⑤</sup>,说明墓表与神道碑荡然无存,墓已面目全非。

项元汴墓大约毁于晚清战火。民国初,传闻有盗墓贼掘发项元汴墓,“得文房器物甚多”<sup>⑥</sup>。又据沈侗麇回忆:“嘉兴西门发掘一明代古墓,棺木完好,其尸面目如生,微髯,冠服未腐,有云系项元汴墓。墓中遗物,皆被盗走。”<sup>⑦</sup>1975年春,嘉兴良三村坟坑浜发现一座明代古墓,“墓内用砖隔成三室”,考古报告推测,“可能是项元汴的三个妻室”,“以前被盗男尸,可能是项元汴本人”<sup>⑧</sup>。但被盗墓和后来发掘的古墓均未发现墓志铭,难以确信是否

---

①《投诚盐运使谢国宝奏本》,《明清史料》丁编(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465-466页。又参何龄修:《李之椿案与复明运动(兼述后明韩主)》,《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44、146页。

②详见李万康:《董其昌〈项墨林墓志铭卷〉中的人物关系与递藏链》,《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9年第3期,第106页。

③陈继儒《携李太学鉴台项君墓志铭》记,“壬戌仲兄少林公歿”(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三三,明崇祯间华亭陈氏家刊本,叶三十八),可知项德成卒于天启二年(壬戌)。

④《〔嘉庆〕嘉兴府志·总目》记:“凡采正史、旧志,以及前贤诗文集,悉本原文,于各条下注明所出……其馀或据公牒,或采乡评,已经考核得实,则以‘新纂’别之。”(《〔嘉庆〕嘉兴府志·总目》,叶十五)而其卷一七“墨林居士项元汴墓”条下备注“新纂”,说明到嘉庆年间项元汴墓依旧完好。

⑤许瑶光、吴仰贤等修纂:《〔光绪〕嘉兴府志》卷一七《冢墓》,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443页。

⑥施蛰存:《北山集古录》,巴蜀书社,1989年,第249页。

⑦顾国华编:《文坛杂忆初编》,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2页。

⑧陆耀华:《浙江嘉兴明项氏墓》,《文物》1982年第8期,第37、40页。

项元汴墓。其中,项坟浜明代古墓,也有可能是项穆墓<sup>①</sup>。

### 三、《项墨林墓志铭》的史料价值

《项墨林墓志铭》收入董其昌《容台文集》卷八(以下简称此本为“文集本”)<sup>②</sup>。《铭卷》与文集本比较,略有出入:一处是首句“陶隐居”,文集本作“陶隐君”;一处是“世无达人,鲜知其解其,在携李项子京乎”,文集本作“世无达者,鲜知其解其,携李项子京乎”;还有一处是“自题韵语”,文集本作“自为韵语题之”。文集本还有一处“他若生卒姻娅之详,子姓曾玄之属”,其中“姓”字当属释文错误,据《铭卷》,当为“侄”。其余无差。这说明董其昌重书《铭卷》时,对原文做过细微改动。可见《容台文集》收录的并不是《铭卷》文本。

《铭卷》总计 988 字<sup>③</sup>,涉及项元汴“家系”“孝母”“懿行”“治家”“课子”“收藏”“事艺”,以及董其昌与项元汴的交往等内容,总体上较为简略,不及黄承玄所撰《明故墨林项公暨配钱孺人墓表》<sup>④</sup>详细。如,黄文记,“公性不屑理家,一切内外壁画,悉倚措孺人,公得精专翰墨”,说明结发妻子钱氏精明能干,帮助项元汴管理家业,使项元汴能从繁杂的家政事务中抽身出来专心翰墨与收藏。黄文还提到,项元汴年至六十,置办棺材寿衣,曾计划撰写个人生平传记,不幸“家衅陡作”,“志不克酬而奄然逝矣”。这些重要事实在《铭卷》中都没有提到。此外,两文对照,还发现表述上也存在一些差异。譬如,董其昌称项元汴放弃科举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在家奉母尽孝:“已念赠公既背养,而太宜人苦节,即仲致身王途,不遑将母,吾宁以青毡故,重远子舍乎。”黄文却记:

公生而颖异,方束发时,学举子业成矣。耻绣鞶帨为名高,乃殚精经史,究极百家言,寒暑不辍,每击节论曰:“大丈夫心领千秋,胸藏万古,须荣名一日何事?”遂弃去青矜业,间一游辟雍,非其好也。

据黄文,项元汴早年入嘉兴县学,十五岁时通过举业考试,入南京国子监就读,进取功名。在游南太学期间,虽然勤奋用功,但依然放弃科举,故其最终

<sup>①</sup>墓内右棺(大房)棺盖上有金刚经拓片,刻有“万历二十七年七月中元东海项穆赞”(陆耀华:《浙江嘉兴明项氏墓》,《文物》1982年第8期,第40页)。该墓未发现墓志铭,与项穆无墓志铭也颇吻合。

<sup>②</sup>董其昌:《容台集·容台文集》,《四库禁毁书丛刊》第32册,第365页。

<sup>③</sup>本节所引董其昌《项墨林墓志铭》,均据此本,不再赘注。

<sup>④</sup>黄承玄:《盟鸥堂集》卷一〇,上海博物馆藏明天启四年刻本。本节所引黄承玄记,均出此,不再赘注。

身份是“太学生”肄业。而胞兄项笃寿考中进士是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sup>①</sup>,当时项元汴已三十七岁。所以,项元汴放弃科举,纯属个人志不在此,与兄居官履职,常年在外为官,他须在家奉养母亲关系并不大。

不过,《铭卷》对黄承玄所撰墓表,仍有重要补充。比如,黄文记,“年及艾而举公”,项元汴“薄视轩冕”,不就。“年及艾”指年届五十。黄承玄透露,万历初,项元汴放弃入朝为官的机会,他没有提到举荐者是谁。董其昌则记:“郡守某以年旧请见,虽复倒屣,殊乖凿坏,为数日不怡,其介特如此。”“郡守某”当为李橡。李橡是江西丰城人,字孟栗,号思切,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隆庆六年(1572)至万历四年(1576)任嘉兴知府,政绩斐然<sup>②</sup>。李橡小项元汴一岁,与其兄项笃寿同年考中进士,故以“年旧”身份请见,项元汴招待甚周,但他坚持居野而不做官,令李橡闷闷多日。这说明向朝廷举荐项元汴的是李橡。

此外,墓表提到“岁大侵”,项元汴“捐廩千馀石,呼吸行賑,且治厂四郊举粥,粥枵腹者以千万计”,黄承玄未记年份。《铭卷》则记“捐廩作糜”之年为“戊子岁”。“戊子岁”即万历十六年(1588)。两年后,项元汴去世,享年六十六岁。黄承玄透露,在项元汴去世前,“家衅陡作”。陈麦青先生认为,“家衅陡作”是指“家中纠纷忽起”<sup>③</sup>。但据清初藏书家赵昱所藏项元汴《芝暘图》自题云:“仆自向罹家难,受制暴党甚矣。吾衰,世故灰灭,闭门待期,遐弃素交,曷胜兴慨!方在戊子秋。”<sup>④</sup>《铭卷》也记:“饥民自分沟壑,不恤扞网。”可知项元汴在嘉兴遭遇连年大灾期间,虽然捐廩行賑,德沛天地,但依然遭到饥民攻击。当时,郭如川任秀水县令,他在主政期间,面对治下惨状,不仅称病怠政,“一日行闾巷,三日卧斋阁”,还反对大狱,任由灾民为非作歹,秀水富室频遭侵衅,相继衰败<sup>⑤</sup>。项家也不例外。据万历皇帝着首辅李廷机发给郭如川的制书,内引白居易《崔咸可洛阳县令制》所谓“宰大邑,如

①董份:《广东布政使司左参议少溪项公笃寿墓志》,焦竑编:《国朝献徵录》卷九九,《明代传记丛刊》第114册,第112页。

②刘应珂、沈尧中等修纂:《〔万历〕嘉兴府志》卷一三《名宦·皇明》,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844-845页。

③陈麦青:《关于项元汴之家世及其他》,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14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250页。

④引自厉鹗:《东城杂记》卷上《项子京芝暘图》,中华书局,1985年,第17页。

⑤李培、黄洪宪等修纂:《〔万历〕秀水县志》卷四《官师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225-226页。

烹小鲜”，交代为政之道，称赞郭如川在“水旱迭灾”期间的表现<sup>①</sup>，可见郭如川息政与其放纵灾民抢劫富室，实际上是承朝廷旨意，转移矛盾，逃避朝廷在赈灾救荒中的责任。

郭如川在项元汴去世后数月离任，高升礼部主事<sup>②</sup>。他在万历十六年曾打算向皇上禀报项元汴捐廩施粥的义举，项元汴“牢让不应”（《铭卷》）。万历二十四年，继任县令李培（山东利津人）主持修纂《秀水县志》，罔顾事实，将赈灾功劳记到郭如川名下，称其“岁荐饥，加意赈恤，全活以万计”<sup>③</sup>。不久，嘉兴知府刘应铎等修《嘉兴府志》，转录《秀水县志》所撰郭如川知县传，这句话又抄录其中<sup>④</sup>。加之王世贞、詹景凤、谢肇淛等文化精英对项元汴多有贬低和丑诋，恶言其“为人鄙啬”<sup>⑤</sup>，《秀水县志》甚至将他描述为纤啬之人<sup>⑥</sup>。项德成兄弟逐渐意识到事实篡改和不实传闻将改变项元汴的历史形象，忧惧先父“懿行之终泯灭”，为了“图公不朽”，于万历四十六年，由项德成主持，率家族按世家墓式隆礼重修项元汴墓，借李维楨、黄承玄和董其昌所撰项元汴行状、墓表和墓志铭，还原历史真相，交代一个真实的项元汴。

故此，黄撰墓表和董撰墓志铭，实际上都具有反驳外间传闻和澄清事实的性质，行文各有侧重。黄承玄重点记述项元汴赡族赈穷、缓急非罪的德业善举，称赞他仁义的高尚人格：

穷交有急，视公为外府，倾囊周之，无难色……族属繁衍，间有贫不能赡者，公计其食指，量给之，岁以为常。至助婚嫁、急生死、挂法网、代赎缓，尤顾念根株，勿因以示德也……公之为人，可仰可望而不可及。孝友洽于家，信义著于乡，恩施暨于族，清贞之操冠于四海。观乎朝，三公不能屈其志；居乎野，诸侯不能得其交。父乐之而康，昆比之而睦，子率之而孝，友习之而谅，臣则之而忠，固百年以来士林中第一流品也。

①李廷机：《李文节集》卷九《浙□嘉兴府秀水县知县郭如川制》，明崇祯四年跋刻本。

②郭如川任秀水县令五年，继任者利津人李培于万历十九年（1591）上任（李培、黄洪宪等修纂：《〔万历〕秀水县志》卷四《官师志》，第210页），说明郭如川于当年升礼部主事。

③李培、黄洪宪等修纂：《〔万历〕秀水县志》卷四《官师志》，第225页。

④刘应铎、沈尧中等修纂：《〔万历〕嘉兴府志》卷一四《秀水县》，第871页。

⑤王世贞：《弇州续稿》卷一六一《徐骑省篆书千文后》、《山谷伏波神祠诗临本》、《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84册，第328、334页。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附录题跋《文氏顾氏翻刻定武兰亭十四跋》，《中国书画全书》第4册，第53、54页。谢肇淛：《五杂俎》卷七《人部三》，中华书局，1959年，第200页。

⑥李培、黄洪宪等修纂：《〔万历〕秀水县志》卷一〇《翰墨》，第666页。

董其昌则重点强调了项元汴好古博物,在收藏上取得的巨大成就,特别提到文彭和文嘉兄弟,以及陈淳、彭年和丰坊等人,为项元汴早年收藏掌眼“把臂”,对其成就志业襄助甚力:

公蒙世业,富贵利达,非其好也,尽收金石遗文、图绘名迹,凡断帧只行,悉输公门,虽米芾之书画船,李公麟之洗玉池,不啻也……子京夷然大雅,自远权势,所与游,皆风韵名流、翰墨时望,如文寿承、休承、陈淳父、彭孔嘉、丰道生辈,或把臂过从,或遗书问讯,淡水之谊,久而弥笃。

董其昌评价项元汴在收藏上足以比肩米芾和李公麟。但他认为世人因此将项元汴比作米芾和李公麟却大为不妥,因为“元章论书,以端明为画字,蔡卞为得笔。伯时故游苏门,苏助之羽翼,党事起,寻负之,一死一生之际,岂有达人之观哉?”“端明”即苏轼,蔡卞为蔡京之弟,米芾扬蔡贬苏,不免有趋炎之嫌。苏轼因“乌台诗案”下狱,遭贬南迁,李公麟负恩避凉,未免势利<sup>①</sup>。而项元汴“弗亲轩盖”,“自远权势”,故以米芾和李公麟“目公之为人”,说明世人“鲜知其解其”。董其昌认为项元汴与权贵势要保持距离卓有远见,因为“吴中好古之家,浸寻疲于势要搜括”,而项元汴收藏虽然冠绝华夏,却“廉者不求,贫者不顾,人以是服远识”。董其昌所谓“势要搜括”,应该是指严嵩之子严世蕃在嘉靖末年嘱地方大员赵文华、鄢懋卿和胡宗宪等人,在江南为他强索富家书画<sup>②</sup>。项元汴收藏在此期间未受影响<sup>③</sup>。

项元汴在书画上的非凡成就,董其昌亦做了高度评价,他说:

公画山水,学元季黄公望、倪瓒,尤醉心于倪,得其胜趣。每作缣素,自题韵语,书法亦出入智永、赵吴兴,绝无俗笔,人争传购。

董其昌是一代鉴赏大家,他的评价并非谀墓之辞。李日华见过一个扇面,上有项元汴“写殷红宝珠茶花一枝,细雪糝其上,如生”,感叹“此老余及与言笑,不意艺事精工至此,徐熙、黄筌,岂遂绝迹哉”<sup>④</sup>。李日华评价项元汴行书,“似李北海,而古雅逸宕过之”<sup>⑤</sup>,并赞“此君艺事,种种有味”<sup>⑥</sup>。据黄承玄云,项元汴“娓娓据案临池,解衣般礴,动逼古人风韵”。同乡晚辈周履靖

①事见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七,中华书局,1983年,第215页。

②张廷玉等:《明史》卷三〇八《奸臣》,第7920页。

③项元汴收藏未遭“势要搜括”,更重要的原因当为赵文华娶项忠长子项经之女为妻,是项元汴表姑父(参丁辉、陈心蓉:《嘉兴历代进士研究》,第229页)。

④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四《万历四十年》,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25页。

⑤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四《万历四十年》,第234页。

⑥李日华:《味水轩日记》卷二《万历三十八年》,第80页。

在项元汴病故后的悼唁诗中,亦称其“砚凝蝌蚪迹”,“临帖素师狂”<sup>①</sup>,可见项元汴生前转益多师,临池不辍,在书法上下过很大功夫,成就非凡。近人以未经论证的署名书画为依据,认为项元汴书画仅处于业馀水平,“正是‘利家’之笔”<sup>②</sup>,显然违背史实。

《铭卷》除了记叙项元汴孝母、收藏、赈灾等事迹之外,还记载项元汴早慧,十岁能文,成家后育六子,管教严格,晚年雅好禅学,与方外名僧往来频繁。因为异梦,将书斋命为“幻浮”,曾在小棺材上题字。特别提到从子项梦原六岁失母,项元汴“鞠诲备至”,视同己出;著名文人皇甫汈<sup>③</sup>写过一篇《墨林赋》赠项元汴。董其昌对其立身治家印象深刻,说他“以俭为训,被服如寒峻如野老。婚嫁宴会,诸所经费,皆有常度”,俨有世家淳穆之风。

在《铭卷》末尾,董其昌回忆他早年游学嘉兴,结识项元汴长子项穆,遂“日习于公”,与项元汴成忘年交。项元汴去世后,董其昌同其子孙交往密切,情谊深厚。所以,面对次子项德成的请求,董其昌以“余受交父子间,不可谓不知公”,欣然应请撰写了墓志铭。

#### 四、《铭卷》的艺术价值

《铭卷》含墓志八十九行,铭文十一行,董氏自题五行,合计1040字。全文以小行楷书之,天真烂漫,结构森然,丝毫不觉董其昌重书此铭时已至耄耋之年。董其昌的深湛功力令好友陈继儒惊叹不已,他在楮尾题跋中高赞:“八十一岁书此,大奇大奇!”

陈继儒与董其昌过从甚密,对其学习书法的师承关系和书风演进了解至深。他在题跋中说:“思翁此卷学杨少师《韭花帖》。”一针见血指出《铭卷》是董其昌学习杨凝式《韭花帖》的得意之作。《韭花帖》是项元汴旧藏<sup>④</sup>,由四子项德明继承,崇祯三年(1630)项德明去世<sup>⑤</sup>后归长子项禹揆。该贴有

①周履靖:《闲云稿》卷三《挽项墨林二首》。

②徐邦达:《嘉兴项氏书画鉴藏家谱系略》,徐邦达:《历代书画家传记考释》,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第45页。

③皇甫汈,字子循,号百泉,长洲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吏部郎中,云南巡按金事。著有《司勋集》《庆历集》。

④杨凝式《韭花帖》以目前所见,有三本:一是清宫本,现藏无锡博物馆;一是罗振玉旧藏本,下落不明;还有一本著录于高士奇《江村销夏录》卷三,入台湾林伯寿兰千山馆,现寄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三本《韭花帖》中的项元汴印章均伪,皆非项元汴旧藏本。

⑤陈继儒《携李太学鉴台项君墓志铭》记:“庚午,月馀不食……竟不起。”(陈继儒:《陈眉公先生全集》卷三三,叶二八)可知项德明卒于崇祯三年(1630)。

陈继儒题跋,言:“余与董思翁见秀州项鉴台斋中。今年丁丑八十,子昆携过山中,老眼摩挲,顿觉一番明净。”<sup>①</sup>可知崇祯十年(丁丑),项禹揆携此卷过华亭余山,陈继儒再次获观《韭花帖》,时年虚岁八十,当时董其昌已辞世近两年。

董其昌与陈继儒到项德明书斋欣赏《韭花帖》的时间不详。他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返籍赋闲期间,曾选辑历代法书钩勒上石,万历三十一年正月刻成《戏鸿堂法帖》,杨凝式《韭花帖》辑刻于《戏鸿堂法帖》第十一卷。这说明项德明在万历二十七年到三十一年之间,曾将家藏《韭花帖》借给董其昌摹刻入《戏鸿堂法帖》,使其有机会反复研味《韭花帖》。

《韭花帖》共七行,介于楷行之间,布局空逸,单字结体险中寓稳,笔法生动俊逸,意趣天成,极尽疏朗萧散之致。董其昌受该贴启发,心慕手追,逐渐形成了个人风格。他后来总结:“余学书三十年,不敢谓入古三昧,而书法至余,亦复一变。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sup>②</sup>董其昌从十七岁开始习字<sup>③</sup>,“学书三十年”正是其在籍赋闲的1602年前后。

董其昌受《韭花帖》启发,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章法上的萧散简远,一是结体上的“欹侧取态”。他发现“小字难于宽展而有馀,又以萧散古淡为贵”,称叹“杨凝式少师《韭花帖》……略带行体,萧散有致,比杨少师他书欹侧取态者有殊。然欹侧取态,故是少师佳处”<sup>④</sup>。董其昌批判元代以来影响深远的赵孟頫书法过“正”,“病在无势”<sup>⑤</sup>。他认为,“古人书皆以奇宕为主,绝无平正等匀态。自元人遂失此法”,而“书家以险绝为奇,此窍惟鲁公、杨少师得之,赵吴兴弗解也”<sup>⑥</sup>。所以为了避免“平正等匀”,董其昌强调“以奇为正”,他说:“古人作书,必不作正局。盖以奇为正,此赵吴兴所以不入晋唐室也……余学书三十九年,见此意耳。”<sup>⑦</sup>

①汪珂玉:《珊瑚网》卷二《杨少师韭花帖真迹》,成都古籍书店,1985年,第28页。

②董其昌:《容台集·容台别集》卷二《题跋》,《四库禁毁书丛刊》第32册,第458页。

③董其昌自言:“余十七岁学书,二十二岁学画。”(董其昌:《容台集·容台别集》卷二《题跋》,《四库禁毁书丛刊》第32册,第449页)

④董其昌:《容台集·容台别集》卷三《题跋》,《四库禁毁书丛刊》第32册,第484-485、495页。

⑤董其昌:《香光随笔·书品》,《董其昌全集》第3册,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第210页。

⑥董其昌:《容台集·容台别集》卷三《题跋》,《四库禁毁书丛刊》第32册,第482、491页。

⑦董其昌:《容台集·容台别集》卷二《题跋》,《四库禁毁书丛刊》第32册,第449页。

董其昌学《韭花帖》，到五十岁左右成就疏空简远、清淡净润的独特风貌，并逐渐形成独树一帜的书法美学思想，对后世影响巨大，成为书法史上里程碑式的重要人物。董其昌的艺术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项元汴收藏。所以，当项禹揆请董其昌重书《项墨林墓志铭》时，他不仅欣然应请，还以其深得《韭花帖》之精髓的典型字貌，谨慎恭敬地书丹，以志纪念。

《铭卷》全文百馀行，千馀字，受碑文所限，字体较小楷略大，与《韭花帖》相若，行距则阔于《韭花帖》。通篇以乌丝栏为界，行均九到十一字不等，纵无定行，横无常列，空灵萧散。书字欹侧险绝，点画波撇秀劲多姿，意境旷远深邃，与康熙对董其昌书法的评价颇为相契：“每于若不经意处，丰神独绝，如微云卷舒，清风飘拂，尤得天然之趣……能得其运腕之法，而转笔处古劲，藏锋似拙实巧……用墨之妙，浓淡相间，更为复绝。”<sup>①</sup>

《铭卷》与《韭花帖》比较，最大的不同在于“淡”：各行皆有明显的墨色变化，蘸墨一次书写五到十字，枯中有浓，燥中见润。董其昌认为：“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东坡云：‘笔势峥嵘，文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也。’”<sup>②</sup>苏轼所谓“平淡”，是指逸于绳墨之外归于天真的超然境界，具体到技法表现，是指以“工”为根底的点画波撇，去除华饰峥嵘，不再炫技造作而回归本然，营构宛若天成的自然朴实。所以，苏轼的“淡”是相对书法技巧而言的简素，并非色相上的“淡”。单就墨色而言，他依然认为“湛湛如小儿目睛乃佳”<sup>③</sup>。董其昌则独照灵襟，与章法上的萧散相呼应，强调墨色从浓到淡的渐远玄味。这在《铭卷》的书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铭卷》是董其昌的行楷佳构。董其昌自言，“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但以行草行世，亦多非作意书，第率尔应酬耳”，故“鲜写至成篇者”<sup>④</sup>。清初鉴藏家顾复证实，其父顾隐亮与董其昌定交时，董已年届六十，“自题赠匾对，大小挂幅题像，皆翁书，维行草耳。小楷小行，邈不可得”<sup>⑤</sup>。这说明董其昌极少为人书写小楷小行，何况长卷巨制？所以在

①杨开第、姚光发等修纂：《重修华亭县志》卷二〇《艺文》，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519—1520页。

②董其昌：《容台集·容台别集》卷四《画旨》，《四库禁毁书丛刊》第32册，第518页。

③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一四《文房四友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7册，第750页。

④董其昌：《容台集·容台别集》卷二《题跋》，《四库禁毁书丛刊》第32册，第450、451页。

⑤顾复：《平生壮观》卷五《明》，《续修四库全书》第1065册，第325页。

《铭卷》卷尾题跋中,张廷济说,“右军为书,暮年更妙,尤董书千百件中所未易一二遇者”,赞叹此墓志铭墨迹为“禾郡宝章”(图4)。金森亦说:“此卷凡百有五行,一千馀言,文敏时年已耄耋,结构处具见良工苦心。洵属艺林宏宝,即在文敏诸迹中亦不易得。”(图5)他认为该卷属于董其昌传世真迹中极为难得的宏构巨制,只有孙辅元<sup>①</sup>所藏董其昌《杨鲁源墓志铭》和《步虚词》可与之媲美。



图4 《项墨林墓志铭卷》  
张廷济题跋(1834)



图5 《项墨林墓志铭卷》金森题跋(1835)

董其昌是继赵孟頫之后影响最大的书学大家,传世著名书迹甚多,但绝大部分真实性难以得到证明。《铭卷》是极少数证据充分的遗存真迹之一,也是体现董其昌取法创变和践行其书法美学思想最具代表性的经典作品,对于鉴定董其昌手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 五、结语

现存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董其昌《项墨林墓志铭卷》是一幅珍贵的书

<sup>①</sup>孙辅元,字辅之,号寻云,杭州仁和人。附贡生。书法董其昌,收藏董其昌真迹最多(潘奕隽:《三松堂续集》卷六《孙辅之醉墨图行看子》,《续修四库全书》第1461册,第195页。潘衍桐辑:《两浙輶轩续录补遗》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1687册,第335-336页)。

丹原迹。1963年底,顾廷龙先生随团访日,到高岛菊次郎家阅览字画,获观其家藏《铭卷》,认为该铭即《容台集》所录原本,推测“董作此文在崇祯八年,有题记,不及备录”<sup>①</sup>。后来,陈先行和郭立暄先生受邀著录伯克利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所藏《容台集》崇祯间董庭刻本时,赞成顾廷龙先生的看法,并据此否定《容台集》存在崇祯三年刻本,认为“今《容台集》二本均有此篇,知二本刊刻均不早于崇祯八年”<sup>②</sup>。黄惇先生认为现存《项墨林墓志铭卷》“收入《容台文集》卷八”,“是董其昌应项元汴次孙项嘉谟(项穆子)之请所撰书的”<sup>③</sup>。事实上,现存《铭卷》在《容台集》所录原文基础上略有改动,既非《容台集》收录本,也非项嘉谟藏本。它是项元汴季孙项禹揆为立神道碑,请董其昌照旧文书丹而留下的碑文墨迹,至今保存完好,是一件珍贵的明代原装真迹。《铭卷》不仅为《〔嘉庆〕嘉兴府志》所载项元汴墓有“董其昌神道碑”提供了重要佐证,也为分析董其昌极富创造力的书法技法与评价其艺术成就的卓越性,提供了重要范本,值得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李万康,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明清书画鉴藏史、美术考古。

---

①顾廷龙:《访日游记》,《顾廷龙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731页。

②陈先行、郭立暄:《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古籍善本书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97页。

③黄惇:《作品考释·项元汴墓志铭卷》,《中国书法全集》第54卷《董其昌》,第270页。按,黄惇先生注项嘉谟为项穆子,亦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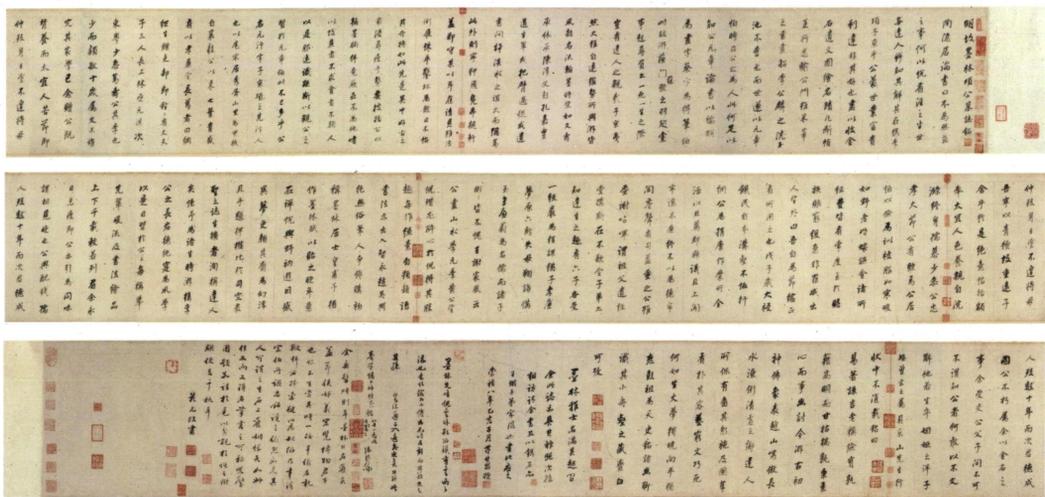


图 董其昌《项墨林墓志铭卷》，纸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详参李万康文